

苏轼与《周易》

徐建芳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轼与《周易》

徐建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轼与《周易》/徐建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161 - 3112 - 1

I. ①苏… II. ①徐… III. ①苏轼(1036 ~ 1101)—哲学思想—思想评论②《周易》—研究 IV. ①K825. 6
②B22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213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91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苏轼研治《周易》的机缘	(10)
第一节 宋代学术氛围的影响	(10)
第二节 蜀地文化传统的熏陶	(17)
第三节 父亲的撰著遗愿	(23)
第四节 自身解脱忧患的需要	(29)
第二章 《周易》在苏轼治学中的地位	(32)
第一节 苏轼对《周易》的研治	(33)
第二节 苏轼对《周易》的评价	(36)
第三节 苏轼对《周易》的引用	(41)
第四节 苏轼对《东坡易传》的重视	(55)
第三章 《周易》与苏轼的处世态度	(59)
第一节 《周易》“变易”思想与苏轼	(59)
第二节 《周易》“不易”思想与苏轼	(85)
第三节 《周易》“时”观与苏轼	(113)
第四节 《周易》“阴阳”观与苏轼	(150)
第五节 《周易》“贞”观与苏轼	(178)

第六节 《周易》之“乾”与苏轼	(205)
第七节 《周易》之“谦”与苏轼	(228)
第四章 《周易》与苏轼的作家修养论	(252)
第一节 “立象以尽意”：“有道有艺”的文艺 本体论	(252)
第二节 “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 “心正则笔正”的人品文品论	(272)
第三节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读书万卷始通神”的积学蓄德论	(280)
第五章 《周易》与苏轼的文艺创作论	(295)
第一节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有意于济世 之用”的创作目的	(295)
第二节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出新意 于法度之中”的创新意识	(304)
第三节 “君子以虚受人”：“欲令诗语妙， 无厌空且静”的创作心态	(313)
第六章 《周易》与苏轼的审美鉴赏论	(319)
第一节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发纤秣于 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韵外之致	(319)
第二节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端庄杂 流丽，刚健含婀娜”的中和审美观	(337)
第三节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 谁敢憎”的兼容并包审美态度	(343)

第四节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只应天眼识 天人”的鉴赏主体论	(350)
---	-------

主要参考文献	(358)
--------------	-------

绪 论

一 选题缘由

王水照先生在其《苏轼评传》中曾这样评价苏轼：“苏轼的思想对于国人生命灵性的启沃，盖不在孟轲、庄周之下，而恐远在程颐、朱熹、王阳明等哲学巨匠之上。他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影响，见于后人的著述文字者还属其次，更重要的是著见于文人学士的心灵。”^① 林语堂在其《苏东坡传》序言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② 的确，没有一个中国读书人不心悦诚服地钦慕苏轼那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圆融通达的处世智慧、刚正不阿的人格风范、独立不惧的大丈夫气概、独步千古的文艺成就的！苏轼早已成了中国读书人立身处世的楷模，没有

①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 页。

② 林语堂：《苏东坡传》，张振玉译，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原序”第 369—373 页。

一个读书人不想去接近苏轼，欲从他那里得其万一的。

然而，对于苏轼何以能够具备如此巨大的个性魅力的根源，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则不尽如人意。毋庸讳言，苏轼的处世态度、文艺思想等的确受到过释、道思想的浸润与启示，这一点早已为前人及现当代学者所注意并作了充分的研究。^① 但对于一个自小就“奋厉有当世志”^② 的志士仁人来说，对于一个只能以科举考试为人生出路、必须以儒家经典为研治内容的封建士子来说，他的立身处世原则首先应来自儒家思想。然而，历来学者在探讨苏轼应对人生困境的精神支柱时，大都只注意到释、道思想，而很少从儒家思想去寻其根由。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缺失。为了探个究竟，笔者认真研读了苏轼的全部诗、文、词集，结果发现，苏轼应对困境、超脱痛苦的更根本性精神支柱应来自易学。这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实：一是，苏轼自小就在其父亲苏洵的指导下研读《周易》，青年时又接受了父亲的遗命——完成《易传》的撰写，自中年至临终前一直在不断地对其《东坡易传》进行撰写、修改、补正，对《周易》的研治可说贯穿终生^③。苏轼在研易解易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受易学思想的影响。二是，苏轼不仅在诗、文、词中大量引用《周易》哲学作理论根据来阐发自己的观点^④，而且其诗、文、词中所表达的

① 如王水照《苏轼选集》：“贬谪黄州时……已由从前的矜尚气节、迈往进取的‘骄气’转而为对旷达超俗、随遇而安的佛老之‘道’的追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另如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在黄州、惠州、儋州期间，佛老思想的确是苏轼处逆境忧患的心理支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等等。

② （宋）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7页。

③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④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思想与其《东坡易传》中所阐发的哲学思想很多都是一致的^①。由此可证，易学对苏轼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三是，苏轼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价值就是撰写了《东坡易传》等三部学术著作，其他都不值一提^②。而且，苏轼曾在诗文中明确表示，佛、道哲学都是虚无缥缈、不可依从的，人生处世还是应该遵循易学中所提出的原则^③。综上所述，易学对苏轼的思想、人生及文艺等产生重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苏轼与《周易》之间的这种重要联系迄今为止尚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即便有个别学者意识到了《周易》哲学对苏轼人生、文艺的重要影响，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也往往是一鳞半爪性的表面研究，没有挖掘出两者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至于全面而细致的论述更是阙如。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学术界对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忽略呢？也许是“苏海”过于浩渺让人不敢问津，也许是《周易》哲学过于高深玄妙令人望而却步，也许是两者历来都是各自领域的研究难点，才导致了研究者对其间联系的回避。

在世界的目光逐渐转向东方古老文化的时代大潮中，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日益向纵深发展的科研趋势下，《周易》与苏轼之间联系的研究必将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一研究不仅能把《周易》与苏轼诗文集集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挖掘出来给当代人的立身处世以有益的启示，而且可使人们对苏轼的认识更加全面、透彻，还可以为今后的苏轼研究拓展出更加广阔的领域，是一项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① 详见本书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

②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③ 详见（宋）苏轼《和陶神释》，（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6页。

二 研究现状

在确定这一研究对象之后，笔者对目前国内外关于苏轼与《周易》之间联系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发现这一研究领域尚没有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一研究领域才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就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或只着眼于对苏轼《东坡易传》中哲学思想的研究。这部分研究者把《东坡易传》作为考察苏轼哲学思想的原始材料，在论著或文章中有所涉及。论著中多少提及的，如余敦康的《汉宋易学解读》，该书主要是论述苏轼解易的特色。尽管在“苏轼的文化价值理想”一节中把苏轼文化价值理想的哲学依据归结于易理，意识到了易学对苏轼人生的影响；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进一步对此作深入细致的阐发^①。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纲》只说《东坡易传》体现了蜀学的三教合一思想，没有论及其他内容^②。冷成金的《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一书在论到《东坡易传》时，也主要是考察其中所体现的哲学观念。只在“经世论”一节中提到《东坡易传》中的哲学观为苏轼儒家的事功精神和经世情怀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这一见解可谓入木三分；但同样可惜的是，作者也没有就此详细深入地展开去论述《周易》哲学对苏轼的多方面影响。^③论文中论及《东坡易传》哲学思想的，主要有孔繁的《苏轼

① 参见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华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8—231 页。

②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3 页。

③ 参见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

《毗陵易传》的哲学思想》^①，陈仁仁的《〈东坡易传〉论“道”与“性”——兼论其中儒佛道三家关系问题》^②、《论〈苏氏易传〉的“卦合爻别”说》^③，冷成金的《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④等。学位论文中论及《东坡易传》的只有刘兴明《〈东坡易传〉易学思想研究》^⑤一篇硕士论文。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对《东坡易传》中哲学思想的阐发，较少涉及易学思想对苏轼人生态度及文艺思想的影响。

或尽管注意到了易学思想对苏轼人生的影响，但却往往是一鳞半爪性的研究。如耿亮之《苏轼易学与其人格》^⑥一文，仅从性通命情的人性思考、道之大全的本体观念、无心而一的致思方式三个角度论述了易学对苏轼人格的影响，而没有论及《周易》哲学对苏轼其他方面的影响。杨庆波和李秀原《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理想人格》^⑦一文仅从《东坡易传》中最主要的几个概念——“性”、“命”、“道”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论证出，苏轼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内涵是具有终极视阈的、与“道”相合的境界。同样没有深入论述易学对苏轼处世态度及文艺思想的影响。齐磊和刘兴明《苏轼人格气象的易学解读》^⑧一文认为苏轼人格气象中所体现的无心与有意、旷达与执著、崇德与广业等特点的形而上根据是苏轼的易道观。该文已开始注意把苏轼的人生与易学思想联系起来进行深入具体的考察，但相对于博大精深

① 《中国哲学》编辑部编《中国哲学》第9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

②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③ 《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④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⑤ 山东大学，2005年。

⑥ 《周易研究》1996年第3期。

⑦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⑧ 《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

深的易学对苏轼的多方面影响而言，该文所论述的范围显得过于狭小了，有待进一步开拓。他如邱俊鹏的《苏轼贬谪时期的理想追求与自我排遣》^①，祁和晖的《解读完整的苏轼不能只重辞章》^②等，虽多少提到了易学对苏轼的影响，但大多是片言只语的论述。

或涉及对《东坡易传》的考证，略微提及易学对苏轼文学思想的影响。如谢建忠《苏轼〈东坡易传〉考论》^③一文指出，苏轼文学思想中以水比喻文理与其解易著作中以水阐释哲理之间存在着一种体用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东坡易传》中的哲学观念深刻制约和影响了苏轼的文学思想。该文首次论及《东坡易传》中的哲学观念对其文学思想的影响，这一见解独具慧眼。但遗憾的是作者也没有就此深入研究下去。金生杨的《也论〈东坡易传〉的作者和系年——与谢建忠先生商榷》^④一文仅是考证了《东坡易传》的作者、系年等问题，没有论及其他内容。

通过以上考察，笔者认为这一研究领域有巨大的研究空间与研究价值。一是研究范围需要扩大。易学对苏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仅局限于从《东坡易传》中发掘易学思想对苏轼的启迪与影响，应把研究范围从《东坡易传》扩大到《周易》原典及苏轼的全部作品中去。二是研究深度有待开掘。对于苏轼终生研治不倦的易学及其解易著作《东坡易传》，目前那些单篇只节的研究显得过于浮泛了，需要作更进一步的深入扎实的探讨。三是研究质量有待提高。可能是哲学专业的研究者往往忽视对苏轼文艺作品进行研究，而文学专业的研究者又大多对艰深玄奥的

① 《天府新论》1996年第5期。

②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③ 《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④ 《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

《周易》哲学望而却步，因此这个在苏轼研究领域中本应受到高度重视的课题却长期被忽略了，需要兼通哲学与文学的研究者投入更多的关注，以做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四是研究方法亟待改善。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如何使哲学理论的阐述与文学作品内蕴的揭示有机地衔接在一起，如何把两种不同的思维表述方式完美地融和为一体，等等，都有待于探索出更加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三 主要研究内容

本着张君勱所提出的“不作人云亦云之文，不作言之无物之文，不作随俗浮沉之文，不作敷衍塞责之文，执笔而书之，必胸中真有所见，而有益于世道人心”^①这一著述宗旨，本书主要探究以下问题：（1）苏轼为什么能够始终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2）苏轼为什么能够养成刚直不阿、独立不惧的大无畏人格，他的精神支柱究竟是什么？（3）在政敌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险恶政治环境中，苏轼何以能够保全自己？（4）苏轼为什么在政事、学术、文艺等各个领域都能取得辉煌的成就？（5）苏轼的各类文艺创作为什么都能达到千古独步的境界？等等。

基于这些问题，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属于基础性研究，包括第一、第二两章。主要考察苏轼研治《周易》的内外机缘及《周易》在苏轼一生治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为后面论述《周易》哲学对苏轼处世态度及文艺思想的影响作有力的铺垫与支撑。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周易》哲学对苏轼处世态度的影响，

^① 张君勱：《中华民族精神——气节》，《儒家哲学之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集中安排在第三章。分别从“变易”思想、“不易”思想、乾健不息精神、谦抑自损智慧、“贞”观、“时”观及“阴阳”观七个角度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这七个方面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的，但为了论述主题的明确集中、逻辑思路的连贯清晰，本书暂分作不同的角度。第三部分论述《周易》哲学对苏轼文艺思想的影响，包括第四、第五、第六三章。主要从作家修养论、文艺创作论、审美鉴赏论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曾有专家建议笔者增加一章，论述一下苏轼易学的成就、特色及苏轼在易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按说这些问题应该包括在本论题范围之内，但笔者的专业是古代文学，只因苏轼诗文中多所涉及易学，因此想考察一下易学对苏轼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及千古独步的文艺成就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至于苏轼易学的成就与特色等问题就不在笔者所关注的范围之内了，那是属于哲学专业的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何况，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来看，易学专家余敦康先生在其《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一书中已经对这些问题做了专章论述，其他哲学专业的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也都有或多或少的相关论述，因此，作为非哲学专业人士，笔者就不敢，也不必再班门弄斧、多此一举了。

由于这一课题属于跨学科研究，研究对象又是一个以艰深玄奥著称（《周易》），一个以博大精深闻名（苏轼），就笔者目前的学术积淀来说，要想把这一探索性研究做到尽善尽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但钱穆曾说过：“……学术亦以能造人才兴事业者为贵。而当以真血性融入真问题，自创自辟，乃能为新时代新学术之真酵素与真火种。”^① 笔者这一研究虽从未企望“能为新

^① 钱穆：《新时代与新学术》，《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时代新学术之真酵素与真火种”，但确可说是“以真血性融入真问题，自创自辟”而成，确是以“能造人才兴事业”为究极目标。笔者自始就希望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找到前面所提问题的答案，一方面使那些处于彷徨迷惘中的人早日洞悉宇宙人生规律，尽早坚定对生活的信心，积极乐观地应对人生中的各种挑战；另一方面使当代人明了治学的本末，清楚提高文艺创作水平的根本途径所在，早日走上正确的治学之路。不管怎样，笔者已尽了最大努力，已从研究过程中领悟到了许多宝贵的教益与道理，相信读到本书的人也能从中获得相当的启示与收获。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中说：“我愿我的书能够帮助人们变得更好些，心灵更纯洁，唤起对人的爱，唤起积极为人道主义和人类进步的理想而斗争的意向。如果我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我就是幸福的。”^①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① 张秀枫主编：《世界 100 位名人的著名演讲辞》，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2 年版，第 260 页。

第一章 苏轼研治《周易》的机缘

苏轼研治《周易》可说得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他处在一个易学研究成为时代学术热潮的氛围中，长在一个易学研究有着悠久传统的地域环境中，生在一个父亲有志于撰著一部《易传》的家庭里，再加上他自己坎坷多艰的仕途人生迫切需要一部指导其如何解脱忧患的“教科书”，等等。这些因素为苏轼能够深入领悟《周易》中的精言妙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共同构成了苏轼研治《周易》的内外机缘。

第一节 宋代学术氛围的影响

苏轼之所以研究《周易》，与他所处时代的学术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儒学高度重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文化政策以来，儒学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儒学以它极富实践理性的思想在改善世道人心、凝聚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的确发挥了释道二教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因此每当时代更替、新朝伊始时，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凝聚稳定，开国君主们便总是大力推崇、提倡儒学。北宋承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而立国，为了尽快巩固政权、安定民心，开国君主赵匡胤更是不遗余

力地在重建儒家思想统治地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据载，赵匡胤即位之初，“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①，还亲自为孔子、颜渊写赞词：“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焉。”^② 赵匡胤不仅十分重视儒学，而且十分重视儒臣。即位之初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③ 鉴于五代藩镇割据之祸，赵匡胤对武臣心存忌惮，故而大力提拔儒臣。以此，赵匡胤还提出过“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④ 的想法。乾德三年（965），赵匡胤甚至说出“作相须读书人”的话，致使宋王朝“由是大重儒者”^⑤，从此确立了宋代“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在封建社会，最高统治阶级的喜好，尤其是取人标准，往往决定着士人们读书治学的方向，所谓“上有所好，下有甚焉尔！上好之，则下从之如风之偃草”^⑥。可以想见，宋代开国君主这样推崇儒学与儒臣对宋代儒学的发展将是一个多么大的刺激。正像缪钺所说：“如果要追寻宋代文化兴盛的原因，首先应考虑到宋代宽宏的文化政策以及对士人尊重与宽容态度。”^⑦ 宋代儒学便借着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重视应运复兴了。

其次，复兴儒学成为时代课题。东汉之后，佛教的传入与道教

①（宋）李焘著，（清）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12—113页。

④（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本纪第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页。

⑤ 同上书，第50页。

⑥（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卷3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5册，第749页。

⑦ 缪钺：《宋代文化浅议》，《缪钺全集》第1卷下《冰茧庵读史存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